

新中国首次将帅授衔始末

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,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,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,还有10名大将、55名上将、175名中将军和800余名少将。

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,当时,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,所以工作量最大、难度最大的“平衡、排队”的任务,就落到了解放军总干部部头上,他们认真研究、反复斟酌,从最后结果来看,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
朱德、彭德怀,因为战功卓著,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;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,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,是十大元帅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;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;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;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、新四军、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;罗

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,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;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。

重要时期的表现,也是参考因素

除了“山头平衡”、时任职务、资历、业绩等因素外,这些将领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,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。

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,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,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,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。用萧克自己的话说是“站错了队”。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”的主要原



1955年新中国首次将帅授衔典礼会场。

毛泽东表态后,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,不参加评定军衔。那时候,刘少奇、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、政务工作,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,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,然而,在他的坚持下,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,除毛泽东之外,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。

彭德怀也在同一些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:我并不需要这个牌,也够不上什么元帅,如果要评的话,也很难说评个什么‘将’是合适的。但这不是个人问题,倘不评一些元帅,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。”

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,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封“降衔申请书”。

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,激动极了。在军委会议室里,他扬起身,走到朱德、彭德怀、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说:这是一面明镜,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!彭德怀插话说,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。毛泽东听后点点头,越说越激动,起身离开座位说:“不简单啊。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,古来如此。”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,双手用力推开窗户,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:五百年前,大将徐达,二度平西,智勇冠中州;五百年后,大将许光达,几番让衔,英名天下扬。”虽然在正式授衔时,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,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,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,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。

类似的让衔、请求降衔、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: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,按条件,他理应授衔上将,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,便立即以自己“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,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为由,申请降为中将。彭德怀几次找他谈

话,都拗不过他,最终,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军之一。

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,历来淡泊名利,心胸豁达。他对人说:我只有从劳之苦,而乏建树之功,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,授我少将足矣。”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,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。

白志文,红军时期就是师长。被评定为少将后,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,他却说:有什么好争的?多少人连命都没了,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,牺牲时不到30岁。我们命大活下来了,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!”

段苏权,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,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。授衔那天,他站在少将行列里。他的周围,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;前排的中将行列中,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;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,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。有同事小声说:老段,你该站前边去,向前走两排。”他却淡淡一笑:组织上叫我站这里,我就站这里。”

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授衔时”

宋任穷回忆说,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,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,但也有一小部分人,对结果并不满意。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,心里却很不舒服;有的人眼泪长流,两三天不吃饭;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,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,点着名要高级军衔;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,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,竟公开地说: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!”毛泽东听到这些事,很不高兴,讽刺道: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授衔时。”

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,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,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,直到1954年9月28日,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,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。单从时间上,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。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,也因此呈现出多面、多层次的立体状态,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“重要现场”,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(据《环球人物》)



毛泽东亲自给将帅们授衔。



“山头平衡”成重要因素

哪些人可当元帅?哪些人能做将军?类似的问题,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,被反复提及。毕竟,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,这次的“论功行赏”是否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,还关系到大部队稳定,谈何容易!连毛泽东都说:“搞评衔,是很大的工作,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。”

邓小平曾指出: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、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。过去,有三个方面军,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,这就自然地、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。”这些“山头”,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,但也真实存在,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,关系仍很复杂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:元帅是行政三级,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;大将是行政四级,享受副总理待遇,自大将以上可算做党和国家领导人;上将是行政五级,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;中将是行政六级,享受部长待遇,自中將以上都是高级将领,可配备警卫、秘书和保健医生、厨师、勤务员;少将是行政七级,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。不同级别之间,待遇、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,因此,除了现任职务、政治品质、业务能力、在部队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,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,还有一条: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。

荣桓是政工元帅,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,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“中国特色”;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;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;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”,除他之外,党内、军内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。

十位大将的评选,也同样综合考虑了“山头平衡”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。

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,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;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,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,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;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,虽然战绩、资历并非最优,但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职务,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;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;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,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样,与“山头平衡”无关;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,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;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,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,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,曾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;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;王

因之一,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。

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。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,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,除了基于战功,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,也是原因之一。

高风险让衔,比比皆是

对于给不给军衔、给怎样的军衔,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,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。

1955年9月初,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。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,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,看上去威武庄严。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,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。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“大元帅”的消息后,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: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,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,多不舒服啊!到群众中去讲话、活动,多不方便啊!依我看,在地方工作的,都不评军衔为好。”



朱德

彭德怀

刘伯承

贺龙

叶剑英

聂荣臻